

# 編後語

在本期面世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這是一個海內外人士早就翹首以望的會議。無論會議決議中載有甚麼內容，都將決定着中國在未來二十年改革與發展的走向。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開放時代，為中國帶來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然而，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產，也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中國經濟走上了政府主導的發展主義之路，政府投資與外國投資驅動和國外需求拉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雙引擎。與此相比，國內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疲弱不振。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固然能在一定時期內推動經濟增長，但也會導致經濟結構扭曲、環境惡化、資源浪費、貧富差距拉大、弱勢群體生存艱難、腐敗尋租泛濫、新興特殊利益集團捕獲政府等嚴重問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亟待轉型，中國的第二次改革必須開啟，這已經成為中國學界和政界的共識。

可是，知易行難。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究竟有無可能？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三篇文章，梳理阻礙第二次改革前行的諸多理念性和制度性障礙。秦暉之文直面福利國家建設與中國發展轉型的關聯。在中國很多學者和政府官員那裏，普遍存在着一種「福利恐懼症」，時常呼籲國人要提防「福利國家陷阱」。秦暉指出，中國發展轉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負福利」和「低福利」的問題。由於舊體制的制度遺產，國家在福利提供方面比比皆是的不公平，以及國家在普惠性和救助性福利提供方面應盡的職責長期沒有制度化，嚴重阻礙着社會經濟的平衡發展，自然難以使內需強勁蓬勃。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中，「負福利」和「低福利」的固化，令很多中國式左右派的論說，給人以時空錯置之感。

陶然和蘇福兵的文章，分析了中國地方發展主義的困境。有很多學者（包括張五常）早已指出，中國既有發展模式的最大特色是地方政府在推動當地經濟增長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陶、蘇指出，地方發展主義的具體運營模式是地方政府動員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推出各種優惠措施，進行招商引資。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在財政稅收方面非但沒有獲益，反而要失血，於是轉而在民用和商用房地產方面壟斷土地供應、推高土地價格和稅費，最終通過「土地財政」實現收入增長。這種發展模式必定導致製造業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膨脹，國民消費受到擠壓，終究是不可持續的。更可怕的是，既有的發展路徑造就出諸多龐大的新利益集團，讓新的制度變革步履維艱，改革難度日益增大，而改革空間卻在日益縮小。

在某種意義上，吳木鑾、計巍巍的文章，是對秦暉之論的一個補充。儘管中國政府和公共政策學界並沒有將福利國家建設作為一種發展戰略選項，但在胡錦濤—溫家寶任內，中國政府的確提出了社會經濟平衡發展的新施政理念。可是，理念歸理念，政府在社會政策上的變革始終孱弱，國民對未來社會風險增強的預期難以平緩，擴大內需以促進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前景也就難以樂觀。